



文学理论评论

在时代变革中开拓丰盈的话语空间

□ 贾晓萌

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新时代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走向纵深。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外延、重要特质和理论价值,大文学观的提出背景、重要内涵以及实践可能,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学新变以及对文艺原创力的呼唤,地方性与总体性的辩证关系等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在媒介环境深刻变革、社会议题纷繁复杂的当下,如何降低话语被误读、情绪被裹挟的风险,是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并思考的问题

2025年文学理论评论在复杂深刻的时代变革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自觉与建构意识,以理性思考烛照现实生活,通过文学实践激活话语空间,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交织共生中开拓出无限丰盈的话语空间。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走向纵深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富有创见的理论研究和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共同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是2025年文学界的重点工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关键议题。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为未来五年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主题,围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繁荣文艺创作”等话题设分论坛,为文化强国建设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澎湃活力。

文学理论评论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相关理论评论话题的讨论。《文学评论》《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中国作家网等理论阵地开设专题专栏,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指导意义,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讨新时代文学理论评论的具体议题,比如梳理中国文论的标识性概念,分析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等。而在相关研究走向纵深的关键阶段,如何准确把握政治术语的规范性表述和理论评论的创新性阐释之间的辨析关系,或许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话题。

立足“两个结合”,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学理论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阵地纷纷开设相关研究专栏,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暨“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批判理论”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相继举办,逐渐形成集群效应,掀起研究讨论热潮。积极倡导短、实、新的文风,《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开设“改进文风大家谈”专栏,推出蒋述卓《技术时代文艺评论如何改进文风》等系列文章,鼓励理论评论积极应对时代变革,更好地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

以理论阐释引领创作风尚,新时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和系统性明显加强。中国作协聚焦创作热点,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召开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两个计划”工作推进暨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通过大规模、跨学科、深层次的理论研讨和实地调研,努力破解发展困境,积极引导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儿童文学等体裁门类高质量发展。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紧扣重大历史节点,各类专题研讨会在相继举办,《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重要理论评论阵地推出专栏专辑,不断深化抗战文学研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学术生态,文学专业力量的整合、交流平台的搭建、优质资源的共享显得愈发重要。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在2025年持续扩大规模、完善机制,先后与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举行揭牌仪式和系列研讨;11月在江苏徐州召开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系列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新时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文学传统资源转化等议题,不断加强对新时代文学的系统梳理、整体研究和理论建设。

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似乎还鲜有一个文学命题能如新大众文艺这般,以巨大的能量激起层层声浪,引发从文学界到全社会的集中关注和热烈讨论。2025年,文学理论界对这一命题的研究热度持续攀升。《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报》等重要理论阵地纷纷推出新大众文艺研究专栏、专辑、专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发多篇理论述评,“新大众文艺:时代脉搏与文艺新变”学术研讨会、全国文学报刊出版界2025“新大众文艺联席会议”暨主题研讨会等活动先后举办,“新大众文艺(东莞)创作与研究中

心”于12月成立,推动相关理论探讨持续深化。“新大众文艺”入选“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等多个年度话题或榜单,成为本年度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热词之一。而“十五五”规划建议则明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更是将新大众文艺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加以倡导。

面对这样一场浩大而持久的文艺热潮,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观察当前的理论研究趋势,从而更加真切地理解新大众文艺的“为何”与“何为”。

一是集中探讨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外延与价值意义。南帆在《“新大众文艺”:从命名到命题》(《文艺报》2025年1月10日)中,率先提出应当“将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孟繁华强调新大众文艺“意味着文化权力的重新配置”(《“新大众文艺”:文艺观念变革的表征》,《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将此新生概念置于极端重要的意义层面加以观照。贺桂梅《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文艺研究》2025年第11期)一文以文明史和世界性视野进行深入阐释,认为新大众文艺主动介入新兴媒介和信息技术革命,综合了中国人民文艺传统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凸显中国文化主体性,既是一种话语转型(从西方现代性话语转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也是一种范式转型(从单一性的文化范式转向总体性的文明范式)。赵勇《从大众文化到新大众文艺——中国当代文艺/文化走向之一瞥》(《文艺争鸣》2025年第7期)、李遇春《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4期)、谢有顺《重新认识经验的力量——谈新大众文艺》(《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等文章,则沿着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脉络,深入剖析新大众文艺的新经验、新特质,为我们带来诸多有益启发。

二是聚焦人民参与、技术赋能等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质素,进行细分化梳理研究。首先是“人民大众”这一复杂的学理概念引发了诸多学者的讨论热情。卓今《“新大众文艺”与群体意识重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石岸书《多重大众化、“超大受众”与文化分析的危机——“新大众文艺”初步论纲》(《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5期)、贾想《超大规模人口与中国式流行文艺》(《文艺报》2025年12月31日)等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人民大众作为创作主体的规范化、能动性与自我表达需求。范玉刚在《“大众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与“新大众文艺”的创新追求》(《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5期)一文中提到,新大众文艺之“大众”扬弃了“大众文化”的“大众”,而接续了“人民”的内涵;贺桂梅也持类似观点,即“新大众”并非仅就数量而言的“群众”,而是指向以劳动者、创造者为主体的“人民”,是经过自觉的政治组织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新大众文艺的基础与理想状态》,《文艺报》2025年1月13日)。此外,李静《技术赋权与新大众文艺发展》(《光明日报》2025年8月2日)、陈亦水《面对技术时代的力:新大众文艺的使命与前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4期)等文章,则是从媒介技术角度思考新大众文艺的可能路径。

在关于主体身份的讨论中,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对素人写作身份的思考。《文艺报》整版推出“挑战在于能否继续写出好作品——‘素人写作’五人谈”,邀请霍艳、项静、柳冬婉、王翠艳、韩浩月五位作家、评论家进行圆桌对话;《文汇报》《文学报》等刊以“大众写作与被看见的‘素人’”为专题,刊发霍艳《素人写作者不会说自己姓“素”》、钟媛《“劳动者歌其事”的社交分享》等文章,共同探讨素人写作的缘起、命名、意义与局限等。目前学界基本认可新媒介传播机制等因素对素人写作热潮的助推作用、“素人”相对于专业作家而言的非职业身份以及此现象为文学界注入的鲜活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避免对素人写作的标签化想象。“素人”不应被窄化理解为基层体力劳动者,“我在××做××”的句式也不该沦为宣传造势的噱头。“素人”与“非素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是否受过专业写作训练并以此为职业或许可以作为一条基本判断标准。而在哪里,我更想强调的是,“素人”身份并不直接关联着作者能力的高低、作品质量的优劣或审美风格的雅俗。专业写作与素人写作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流动空间,而这也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活力所在。

还有一些研究和活动侧重提取新大众文艺的典型地方样本,特别是深度剖析清溪文学村庄现象、西海固文学现象、东莞素人写作现象。5月,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组织白烨等数十位专家赴宁夏西海固实地调研,随后结合调研成果在北京举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西海固文学现象研讨会”,围绕“西海固作家群现象对繁荣新大众文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启示与意义”等议题展开研讨。《文艺报》多次开展实地调研活动并刊发《文学点亮精神之光——“西海固文学现象”探源》《他们是新大众文艺的创造者——东莞素人写作群启示》《文艺星火正在广袤乡村熠熠生辉——铜川市乡村文艺小院走访记》等深度报道。《中国作家》杂志也在2025年推出“新大众文艺”之清溪村、东莞小辑等。

三是将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研究角度或方法。张清华《“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周志强《网络文学的“痛爽文”与微末人生书写——新大众文艺的游戏现实主义》(《文艺争鸣》2025年第7期)、张莉《从脱口秀、有声书看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叙事美学变化》(《文艺研究》2025年第11期),以及《文艺报》刊发的周兴杰《“社交共评”:新大众文艺评论的当下形态》、孙佳山《新大众文艺与节日文化的数字化重塑》、丁鹏《沂蒙二姐》走红: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始于田间的诗》等一系列文章,敏锐捕捉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各文学门类和泛文艺产品的交互性、跨界性等特点,充分彰显出新大众文艺的理论阐释力、理论创造力和开放包容性。

四是反思性研究增强。新生事物的快速兴起,需要冷静的思考加以正确引导。当一个命名的边界过于泛化,其应有的价值就面临贬值的风险。何同彬《浅谈“新大众文艺”的几个可能的误区》(《文艺风》2025年第3期)一文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提醒学界切忌一哄而上,要警惕媒介依赖与技术主义、文学文本的衰微等潜在问题。而随着相关理论研究逐渐进入沉淀与深化阶段,对这么几组关系的思考或许有利于我们对新大众文艺的准确把握和理性引导:首先是“是与否”的关系,当我们几乎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时候,“什么不是”的问题反而更加重要,“如果一个概念过于泛化的话,也就取消了其质的规定性与独特性”(李云雷语);其次是“新与旧”的关系,我们对“新”的鼓励并不意味着要以“进化论”的逻辑全盘否定旧有理论或传统文化;最后是“精英与经典”的关系,非专业化创作涌现出的活力是对固有精英写作的有力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阻断新大众文艺的经典化路径,我们鼓励的是新大众文艺不断向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迈进。

大文学观与文艺新生态的积极构建

2025年下半年以来,大文学观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这既是对媒介技术、文化语境、审美风尚等一系列时代变革的积极回应,又是面对文学发展困境的有力突围,有利于充分激发新时代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非虚构写作蔚然成风到演艺明星跨界写作,从一万多人参加“小红书”发起的“身边写作大赛”,到陈鲁豫播客“岩中花述”的对谈内容被出版成书、首日销量即突破4.8万册,文学边界不断延伸,“大文学观”的树立和倡导正当其时。

11月在四川成都举办的2025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活动,将“大文学观的疆域重绘与理论可能暨四川作品研究”作为年度活动主题,充分显示出学界聚焦理论前沿、设置重要议题、涵养健康生态的主动与自觉。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在《文艺报》上刊发署名文章《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从大文学观的时代语境、重要内涵以及实践可能三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全面呈现目前相关讨论的概况。

从字面上直观来看,大文学观的核心在于一个“大”字,我们可以尝试对“大”进行多维度拆解,进而触及“大文学观”的内涵与价值所在。大文学观之“大”在于聚焦“国之大者”——提倡的是文学与生活、社会、时代的密切联系,正如李云雷在刊于《光明日报》的《新时代文学要有“大文学观”》一文中提出,要让新时代文学“向更广阔的生活敞开,向艺术和科学敞开,向人民与大地敞开,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人的希望、梦想和理想生活”。“大”在主体扩容——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人民大众全方位介入文艺创作生产、传播、阅读、评价各个环节,新大众文艺及素人写作群体带来鲜活的主体性力量,文学潜在读者的规模和能动作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在跨界融合——跨文体更新、泛文本融合、跨媒介转化、多产业联动是近年来文艺发展的显著趋势。《文艺报》整版刊发《以“大文学观”照亮当代文学研究》,文中提到“‘大文学观’的核心是要打破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的封闭性,倡导一种跨学科、跨文体、跨文明的整体性视野”。“大”在构建文学生态的“大循环”——刘涛在《大文学观刍议》(《文艺报》2025年12月10日)中提出,“文学活动应该是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媒介等要素的大循环”,“大文学观”正是鼓励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各要素环节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扭转已受到诸多质疑的“圈子化”、同质化等不良倾向。

与此同时,无论是从文学史意义还是概念界定的角度而言,对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辩证关系的思考都十分必要。《中国作家》杂志社在2025年8月30日召开“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座谈会。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两者并不是二元对立、彼此割裂的关系,大文学观是对纯文学观的整合超越。“我们不是要告别纯文学,而是要从纯文学出发,走向更大的文学实践。”“纯”为“大”提供了内核支撑,“大”为“纯”拓展了生长环境。”(《对近期“大文学观”讨论的观察与思考》)

在讨论的最后,我们还应将大文学观置于更深层次的实践层面进行理解,去思考如何在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重建新时代的文学根脉”。贺绍俊在《从思想盔甲到文学生态》(《文艺报》2025年10月22日)一文中积极呼吁,“大文学观应该是一种主张多样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主张建构良好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也就是说,在这个良好的文学生态里,不同的文学品种都能够找到它适合的土壤和环境。”由文艺报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理论评论研讨会”等学术活动积极探讨文学理论评论如何有效应对“大文学”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原创力的重申

2025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变革力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在文学领域,人工智能写作与数字人文建设在本年度被集中关注。围绕主体性危机、技术伦理和AI赋能创作等话题,学界展开热烈讨论,基本的共识是,我们应当积极拥抱变化,让AI为我所用,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守护文学的主体性。钱理群在2025年初一场研讨会上说,“我们对AI的功能价值严重估计不足”,“我的初步判断是,人类将进入一个人工智能和人的心智相互支撑、相互博弈和制约的时代”。中国作家网策划推出“AI时代的文学与未来”专题,邀请高远东等12位作家、批评家就“人文学”领域问题对DeepSeek提问,并对DeepSeek的回答略作回应。《文艺报》邀请诗人张二棍、戴潍娜与DeepSeek同题创作,并同步呈现王士强、李壮两位评论家与DeepSeek对诗作的评论,颇具真实意味。《扬子江文学评论》推出“人工智能与文学焦虑”专题,邀请近十位作家评论家同题共答。其中,黄平将AI之于文学(或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与计算机之于数学进行类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数学家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数学不仅仅是计算。如果计算器无法取代真正的数学的话,AI也无法取代真正的写作”。此外,陈楸帆《DeepSeek之后,我们将如何写作?》(《扬子江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李静《走出“平均化”陷阱:AI时代文学批评场域再反思》(《文汇报》2025年5月23日)等文章侧重探讨人工智能对文学生产、传播、接受、评价全流程的影响介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青年论坛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文学计算批评的未来:数字人文青年实干家论坛”等学术活动的举办,不断推进数字人文跨学科建设与实践应用。

此话题进一步引申出关于文学原创力的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大大提高写作效率的同时,也将文本重复和抄袭问题再一次暴露出来。对此,《人民日报》刊发的陈漱《始终葆有对原创的尊重与敬畏》、鲁大光刊于《文学自由谈》的《文学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等文章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剖析。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或被观看的“风景”,正如专家在《南方文坛》杂志等主办的“当代中国地方性写作新浪潮”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的,“优秀的作者不再将‘地方’视为封闭自足的地理空间和生活空间,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理解中国、反思现代性的基本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差异性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被充分讨论,“地方性的”理论与实践可能被前所未有的地拓展。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女性文学延续着近年来的创作和研究热潮,如“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迎来她的第五年,持续发出女性声音。在媒介环境深刻变革、社会议题纷繁复杂的当下,如何降低话语被误读、情绪被裹挟的风险,是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并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青年干部)

“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和文学实践

近年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一系列“新地方写作”的命名与研究热潮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议题。

地方性写作所折射出的时间意识向空间意识的转向被持续关注。当线性时间的研究方法越来越难以应对复杂现实,“地方”这样一个可触摸、操作性强的方法便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抓手。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每期均设“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专栏,而立足于这样一个史学研究视野,其中刊发的张清华《文学史终结》与“文学地理复兴”——新世纪文学的另一视角》、郭冰茹《地方写作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路径》等多篇文章却直接指向“地方”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塑造作用,这本身足以说明“地方性”的方法论意义。杨庆祥《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再谈地方性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则就这一话题进行更加具体的阐述,认为“地方性”的方法论意义主要涵盖三个层面,即作为一种“文学策略”助推期刊和青年作家出场亮相,作为一种“认识装置”来把握地方与中央、地方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以及强调“一种健康的文化有机体必须建立在多元的地方性基础之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创造出新的地方性”。

而当理论命题与重大文学行动深度融合,“地方性”的实践意义得到了充分激发。2025年,中国作协实施“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行动,组织文学名家走进江西修水、新疆吉木萨尔等地,推动优质文学资源直达基层。从金宇澄《繁花》、李娟《我的阿勒泰》到徐则臣《北上》,多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持续激活全国各地的文旅热潮,“IP+在地文化”的模式为文旅融合提供新动能。类似的例子还有前文提到的湖南清溪村、宁夏西海固、广东东莞所孕育的文学现象等。我们看到,“地方”不再是空洞的坐标方位或悬浮的学术议题,而能够经由重大文学行动与一方水土、一方人产生紧密联结,重塑我们对地域空间的文化想象,为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此外,城市文学、海洋文学、边地文学等也成为新的增长点。“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表达——上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济南文化书写”等研讨活动相继举办,形成散点辐射效应,带动城市文学研究热潮。“2025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在福建厦门举办,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研究建言献策。刘亮程《长命》、张者《天边》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书写边陲地域故事,跨文化、异质性研究释放出较大潜能。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或被观看的“风景”,正如专家在《南方文坛》杂志等主办的“当代中国地方性写作新浪潮”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的,“优秀的作者不再将‘地方’视为封闭自足的地理空间和生活空间,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理解中国、反思现代性的基本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差异性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被充分讨论,“地方性的”理论与实践可能被前所未有的地拓展。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女性文学延续着近年来的创作和研究热潮,如“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迎来她的第五年,持续发出女性声音。在媒介环境深刻变革、社会议题纷繁复杂的当下,如何降低话语被误读、情绪被裹挟的风险,是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并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青年干部)